

保守與進取

十九世紀俄國思想與政治變動之關係

段昌國 著



大安出版社 印行

保守與進取：
十九世紀俄國思想與
政治變動之關係

段昌國 著

大安出版社印行

本書簡介：

本書旨在探討十九世紀轉變中的俄國點將壇上，保守派、自由派以及激烈各派的思想與行動主張，與俄國社會經濟及政治現代化變動的交互影響關係。十九世紀的保守與進取的離合互異，終成為二十世紀變自下的革命風暴的離異相合。

著者段昌國先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保守與進取：十九世紀俄國 思想與政治變動之關係

著者：段 昌 國
發行人：蕭 淑 卿
發行所：大 安 出 版 社

電話：九 三 二 七 二 四 四
辦事處：台北市羅斯福路5段269巷21號
郵撥帳戶：一 〇 一 〇 三 八 七 七
大 安 出 社 版

印刷者：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8號
電話：九 八 三 一 〇 六 一 ~ 二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第三四五九號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李邁先教授
To Professor Cyril E. Black

自序

畢業離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轉眼就五年了。回想在狄更生樓（歷史系），火石圖書館的歷史研討室及指導教授 C.E. Black 所在的柯溫樓的一千多個日子，彷彿還在眼前。從第一天非常唐突的坐在 Black 與 Wortman 兩位教授合開的近代俄國專題討論課上，便怎麼也沒想到會以十年前李邁先教授啓蒙的俄國史為研究對象。事實上，我是因為現代化的興趣去找布萊克教授的，那是郝延平先生回國講學帶領我們認識他及現代化其他種種問題。但絕沒想到在臺大歷史研究所展讀他的書，幾年後卻在普大坐在他的課堂中。從比較現代化到俄國，這是一段波譎雲詭的道路，對我而言，這也是一段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的歷程。

這是由於中國從頭便是以「敵國之禮」看俄國的。雖然李邁先師已為我們啓開了觀察的一角，但在歷史與政治的層層糾葛中，要平心靜氣把俄國當作一個民族，一個文化的實體來分析了解，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更何況近代的俄國與中國都遭逢大變，過去的種種纏結仍然持續不斷，新的恩怨塵網又給這兩國的歷史面貌抹上一層陰影，要想撥雲見日，理出頭緒，更是憂憂乎難哉。

俄國與中國關係久矣。然而，中國從不曾真正了解過俄國。

這是因為我們都是從政治的角度，更確切的說，從被侵略者的地位來看的。我在普大，嘗試要把自己長久以來的習慣看法修正來接受「西方」的觀點，無論是知識方面或思維方面，都是極大的挑戰與壓力。這不僅有浩若煙海的論文著作要閱讀，更難的是民族的感情，時代的憂患意識都要藏諸於己。不然，同堂上課的總有幾位俄國「移民」或「流亡」同學在座，相對之下，不免會興起「拔劍四顧心茫然」的悵惘之感。

因此，這幾年要特別感謝布萊克教授的親切指導。他的爲人行事也給我很大影響，遺憾的是，我只有這一些微薄的成績，何其慚愧之至。也要謝謝李邁先教授的啓迪，以及 Richard Wortman 與 Robert Tucker 教授，劉子健教授，牟復禮教授 (F. mote) 的指導。我也很遺憾未能於我的嬌嬌賀榴霞教授在世時多跟她學俄語，以至後來出國吃了很多苦頭。謝謝普大及火石圖書館給了我最好的學習環境，以及那些給我無私無我指導的老師們。

目次

自序	1
一、前言：近代俄國轉變的本質	1
二、俄國改革運動中的保守思想	17
三、舊政權危機與激進想潮的興起	43
四、兩種形式的改革—微德式與史托里賓式 及俄國的轉向	71
五、結語	101
六、附錄 Russia and the Winds of Change in China, 1900-1905	107
Modern Russi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05-1911	169
徵引及參考書目	225

一、前言：近代俄國轉變的本質

十九世紀的俄國是個紛紜擾攘，錯綜複雜的時代。無論是從思想、政治、社會、經濟任何方面來看，都呈現出「漁陽鼙鼓動地來」，變革頻仍的現象。

事實上，帝俄社會兩世紀以來早已經歷了無數的變遷，接連不斷的改革，革命、暗殺、戰爭、領土糾紛及社會衝突，都反映出俄國的社會結構與領導分子的思想及行為模式不斷地適應調整。但在同時，俄國社會也正進行一個更基本的轉變，這個轉變主要是由西歐及中歐社會模式所刺激產生的。這些社會無疑是站在革命性轉變過程的前端，由智識革命為源泉，政治變動為先期影響，而配合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與社會變遷。這種革命性過程所達到的各種層面的成就，或則可以通稱為現代化，是西歐社會變動的原始模式，也是其他所有後來的社會，包括俄國在內，追求的理想目標。

俄國政治領導者面臨這個劇烈變動的最初反應是採取，至少是適應那些適合於維護傳統社會，而免於鄰國日增的威脅的現代制度。這種發展的動機是防衛性的，它所採取的制度本質上對社會的結構與政治的內涵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就這個意義來說，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充分說明了這種現象。他的改革固然將中央政府的行政與軍事制度合理化，同時加強了政府對貴族地主與城鎮

市民以及地主對農民的控制，但他從未曾計劃將西歐現代化先進國家的社會與經濟制度嚐試來適應俄國社會。^①這樣，傳統的社會結構固然成功的維護下來，但相對的說，俄國社會的靜態平衡與西歐的活力變動日益形成差距，^②仍不斷迫使俄國領導分子關懷備至，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亞歷山大一世與尼古拉一世任內，有許多改革計劃認真考慮，有些則已付諸實施。但是這些少數的改革方案，在沙皇完全控制立法創制權，很少與民衆意見連繫的氛圍下，正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說：無論統治者或被統治者都是出於他們的行為法則，常常並不了解改革的意義。^③而且我們可以更進一步了解，在克里米亞戰爭（1854—56年）前的俄國，事實上瀰漫著一種虛誇的意識，否定任何制度的安排是國家福利的可能資源。^④因比改革的意義並不在於能否擔負功能發揮的角色，而在於他們是否有能力給傳統俄國的三大柱石：「專制政體，東正教與民族國家」賦予更深層的具體內容。

然而，另一方面，懷抱改革心態的知識分子，以俄國兩京——聖彼得堡與莫斯科為中心，不斷散發政治危機與期待改革的論調，下面引用一位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在後來的回憶說：「我們相信，唯有災難及慘烈的戰爭才會帶來有意義的全面改造，停止繼續的腐敗」。^⑤這種帶有悲觀意味的觀點，在十九世紀初俄國外交軍事節節勝利時，或許得不到人民廣泛的共鳴，但是可反映出知識分子在積弊重重下要求改革的心理。這種心理意識在變亂叢生時，便很容易傾向過激的言論，正如1856年一位匿名的作者宣告：「激烈主義的時代在俄國來臨了，就像它在西歐的情形一

樣」。^⑥不過，事實上，並不完全一樣。這個時期的俄國激烈改革派尚未興起革命推翻的主張，甚至要組成反對黨都相當猶疑。我們試看 1857 年奧加瑞夫 (N. P. Ogarev) 在流亡法國的北極星 (Poliarnaia Zvezda) 上寫道：「我們並不是要號召成爲一個憤怒的反對派來面對新政府（指亞歷山大二世），而是要提供堅定明白的批評，讓政府從其中可以公開而坦誠的察知錯誤」。^⑦ V

這在政治上還是很溫和的作法，但所散發的反政府情緒仍使得保守派震驚，他們轉求內在的省察以挽救政府的權威。沙馬寧 (Iurii Samarin) 便是一個代表，他是當時著名的神學論辯家，即號召跟隨者「轉向我們自己，研究國家衰弱的基本原因，想出一個治療的方法」。^⑧從上面粗疏的敘述，可以約略了解到十九世紀中葉前，俄國改革運動中隱然有個分野，傾向保守思想的以防衛舊體制傳統爲主，傾向激進思想的以批評時政，突出個人主義爲主。這種爭議在克里米亞戰前尚不明顯，但想訴求羣衆公意的心理則是相同的，因此宣傳小冊的作者，雜文家及室內演說家無不公開討論各種觀點看法。對應之下，報章雜誌涵蓋了各類不同的意見都能被寬容的新聞檢查官接受。據俄國學者李索夫斯基 (N. V. Lisovskii) 的統計，在尼古拉一世時代 (1825—55)，每年創辦的報章雜誌平均是 8.3，然而從 1856 年到 63 年期間，每年出刊的雜誌平均達到 33.4，^⑨可見輿論發皇的現象。 V

這種充滿意見活力的情形的確使亞歷山大二世政府比尼古拉的軍事政權有更多管道接觸輿論的壓力，同時，知識分子也比過去更希望獲得地位來開導政府領袖。這兩個新形勢的交互影響，在克里米亞戰後，終於促使官方意識形態的破產，無法再堅持爲

了國家福祉的需要而維護制度化傳統的觀念。而軍事的挫敗，更使得俄國承認落後衰弱不如西方，自然傾向外來的觀念，放棄舊有的原則。一位聖彼得堡的檢查官說：「昨日的思想，今天已是陳舊了」，^⑩正代表了這種求新的潮流。

從1856年到57的兩年中，俄國期刊討論西歐國家的文章無論質量都有驚人的增加，^⑪在此同時，把俄國內部事務尤其是爭論的議題與西歐國家比較改正也開始出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奧國的經驗為鑑討論解放農奴的問題（奧國於1849年解放農奴）。一般西方史家都認為克里米亞戰敗的刺激，轉變了俄國官方意識形態，贊同改革而以西方為模式，那麼，1861年的解放農奴就成為俄國政治領袖轉向西方觀念與制度，從被動防衛到主動適應態度轉變的分水嶺。當然，1861年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年代，如前所述，俄國有些方面的改革早在此以前已經進行，而有些方面直到十九世紀末仍未受影響。但在近代俄國轉變過程中，1861年的解放農奴確實引導了全面性的變動。

解放農奴的變動層面並不僅限於農村之中。農奴的解放，也不單只是來自農村的壓力。二十世紀初的俄國自由思想家史羅夫（Peter Struve）^⑫就已經懷疑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時的一般論調，認為壓力是來自於農業生產系統內部，導至農奴制度的持續性解體，終於因它本身的負荷而崩潰。史羅夫辯說：也許以農奴為基礎的生產量不如自由農的農業系統，但從個人農莊的觀點來看，一旦把同意分配的田地劃給農奴，則在消除了農奴免費服務的有利因素，而代以生產量雖較高，也較昂貴的自由農後，在農奴與自由農之間確切生產量的不同就變成難以估計的了。他更

繼續指出：農業的進一步成長是建立在鐵路的運輸上，農奴的維持根本無法與鐵路化的功能相比。^⑤史羅夫的這些論點，很顯然不僅牽涉到 1860 年代，更牽涉到一個不確定的論題，即在以後的發展中，農奴與鐵路建造之間是否具有絕對的衝突？事實上，沒有鐵路反而保護貧瘠地區的農業可以連結至黑土帶的北邊，所以能造成這種情形，便是在冬天歲收後，可以大量利用免費的農奴，依賴馬車等運送穀物，而延長了市場的交易半徑，通往那些個人農莊。史羅夫的論點充分說明了十九世紀俄國農村的生產力，並未低落到促使農奴制度的解體崩潰。

不過，從較大的歷史背景說，我們自然要考慮到社會經濟的一般狀況。1860 年代的俄國飽受內憂外患，無論是社會結構和經濟形態都處於歷史轉型的時期。以社會言，俄國社會正從絕對君主專制體系蛻變為農民、勞工、知識分子及資本家社會階層分化日益明顯的體系；以經濟言，不僅農業和商業處在上升發展的新階段，工業化更是波濤洶湧的潮流，逐漸從農業經濟型態轉變為以工業生產為主的資本主義經濟型態。俄國的知識分子因此有較大的活動空間。可以從事於「改造」，「教民」的努力，因此大體上傾向於激烈思想，政治安定就不是他們的理想目標了。這是後世知識分子所缺乏的有利條件。這個社會經濟的背景與思想轉變的關係牽涉的層面很廣，十九世紀下半葉俄國思想史上的爭論都是環繞這一主題而進行的。

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的轉變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俄國正統的官方意識形態是中央集權化與高效率的官僚組織，這是支持君主專制政體的兩大理論架構。但在克里米亞戰後，地方自治與行

政分權化的改革呼聲甚囂塵上，^⑩在這個受法國模式影響的政治設計中，地方各省繼承了俄國古老的地方主義精神，擁有財稅權與行政權。換句話說，這種「地方自治」如果實施成功，不僅削減了沙皇的統治權力，遇到變亂的機會地方官員是可以背叛中央政府的。這點在1856年聖彼得堡監察官維拉底米爾西（Vladimir Tsie）的計劃中，提議地方官員在選擇人民服務時賦予決定的權力，^⑪可以證明不是誇張的。

大體上來說，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俄國思想，不論它的派別有何不同，主要是依循兩個潮流進行的，但這兩個潮流看似各具特性，實則相互混雜，甚至兩者之間已無從截然劃清界限。一個著重於持續性，大部分屬於政治領袖與高級官員為代表，從彼得大帝到二十世紀初的徵德（Sergi Witte）與史托里賓（Peter Stolypin）一脈相承，都企圖調整俄國的制度與社會以適應現代化的要求。他們在傳統的結構中尋求革新，雖然有不同的重點，大體上是沿著一個共同的意識基礎而發展的。

另外一個著重於變動性，主要是以知識分子為代表，他們有自由派、激進派、民粹派（Populists）西化派，十二月派（Decembrist）以及後來的社會主義派，馬克思主義派等，儘管立身言論有所不同，但都非屬政府官僚階層，與統治圈也經常保持距離。從他們的宏言讜論，反映出對西歐社會的廣泛了解，同時也反映出對俄國人民命運的嚴肅關懷。他們終極目的是思想與行動的合流，但直到帝俄崩潰始終未掌握通往政權之路，布爾雪維克革命成功後，甚至連透過立憲國會形式參預政治的機會也消失了。但不可否認的，由於他們的著作言論廣泛地流傳，在十九世

紀俄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他們仍具有深遠的影響。

這兩種思想潮流，事實上都是傾向於改革的。但由於他們根據的經驗事實不同，他們所強調的改革觀念與方法也隱涵著不同的性質。微德與史托里賓基本上是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經驗事實，因此在他們看來，解放農奴是西方經濟發展的刺激，同時體認到工業化將可增強國防軍事力量，因此廢除農奴是爲了要創造以生產關係爲前提的社會經濟架構，這樣，生產力量包括技術與投資機會才能完全利用。從這點來加以解釋，那是完全用自主性的經濟需要的精神來驅使解放行動，換句話說，它成爲個人的政治決定在控制政府。這牽涉到兩個基本問題：第一，傳統政府體制不能更改，亞歷山大二世政府的決策官員維魯耶夫（Count Valuyev）在他的日記中坦白說：君主專制自我維護的目的是解放農奴決定時最具影響力的因素。^⑯這說明了沙皇在面臨農民暴動日益蔓延情況下，爲求自保的行動，但反過來也證明：在任何壓力下，傳統的政策可以改變，傳統的體制不能改變。第二，解開農奴的纏結，究竟能刺激推動工業化的熱望到什麼程度？這是一個頗有爭論的問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俄國思想界，不僅民粹主義派與社會主義派爭論不休，就是微德與史托里賓也是看法紛歧。^⑰這點將在後面詳細分析。此處可以強調的是，第一個問題說明了微德與史托里賓的改革運動，不可避免具有保守性的色彩。但第二個問題卻正說明他們的改革又具有進取推動的力量。

前面說過，這兩個流派之間並不是相互獨立的，雖然根據的經驗事實有所差異，在實際的歷史變動過程中，卻不免因各自遭

遇的不同而發生相互交流的現象。大體說來，十九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普遍反對君主專制政權，贊同解放農奴。這種態度主要基於人道精神，痛恨農奴的存在而對農村生活的改善賦予深切的關懷。

我們知道俄國知識分子，與西方的知識分子一樣，大致總是和教會結合在一起的，因此比較具有淑世的情懷，強調以同情與感覺來對待世間不平等的問題。農奴在他們看來屬於道德倫理的層面重於社會經濟的層面，所以農奴的解放是道德責任的實踐意義重於社會安定的政治考慮。這一種倫理傳統早在十八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身上就明顯表現出來了。^⑮所以他們一方面同情農奴，大聲疾呼廢除，同時反對君主專制的傳統，另一方面則維護農村社會的價值體系，懷疑工業化將造成嚴重的社會變遷，因此後來也痛恨小資產階級，對普羅階級更懷有恐懼之心。從第一層來說，在十九世紀俄國社會的發展中代表著進取的力量，但就第二層來看，明顯的反映出濃厚的保守意義。

不過，必須要說明的是，這裏並不是把俄國的知識分子看作一個籠統的觀察對象。而是在歷史的實際進程中，從意識形態的社會功能，也就是貝爾（Daniel Bell）所說的「把思想轉化為社會動力」^⑯的觀點來看俄國知識分子如何對一般人發揮說服力，以導向共同的社會行動。因此，如果深一層來看，內在與外在情勢的限制也使得俄國知識分子受到相當的影響，有些較傾向傳統的價值觀念（如斯拉夫本位主義者 Slavophiles），有些較傾向西方的觀念思想（如西化派 Westernizers），但如韋伯所說當文化思想因素與社會經濟形態發展有密切關係時，傳統保守派與西化激

進派之間相互影響是非常自然的，反過來說，外在的政治社會情境的變動也會對他們的思想成分有所交互反應，其間不免經過一個相當期間的滯化過程；不但知識分子本身因新成分的摻入而發生變化，俄國政治社會也不能不有相當的改變以求得在新環境中的成長與發展。

大體說來，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是在長時期塑造完成的，制度與態度的架構中產生的，從彼得大帝時代的歷史經驗可以說明，要把西方的觀念轉化成俄國的文化傳統中，一方面要借助於政府的同意，一方面要仰賴君權，這樣才能輕易獲得理想的支持，使社會與人民依據他們的理論藍圖轉變。因此，理念成為行動的引導，而不僅是分析的工具而已。正如俄國詩人伊凡本寧（Ivan Pnin）所頌揚的：改革者「將他的規則指示世界」^②從這個經驗出發，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多數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因此採取漸進的方法來達到根本的轉變。有趣的是，這一流派與傳統制度的支持者（多半是沙皇家族及其隨從）衝突最劇烈。直到1906的根本法（the Fundamental Laws of 1906）成立後，才提供一個妥協的基礎讓雙方得以遵行。但據政治史學者韓森（Leopold Haimson）的研究顯示，自由派中根本缺乏內在的凝聚力，彼此之間看法紛歧，如民粹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對價值、道德、制度幾乎是完全不同的觀念看法，^③因此形式上雖完成了某種程度意義的四次國會（Duma）甚至持續到臨時政府時代，立憲政治的機會還是葬送在革命的浪潮裏。這段政治糾紛的過程，並不是我研究的對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派在政治危機中何以成為革命派與保守派之間的中介人物，社會經濟的情勢轉變是否造成他們

之所以如此的必然歸趨呢？

事實上，這是個隱含了歷史命定論的問題。不過，從歷史的實際發展看，自由派並未能了解當時政治的衝突與經濟的衝突是相互混合，至少在理論上，是針對著完全摧毀俄國傳統生活的架構。自由派知識分子把他們文化秩序建立在理想的俄國農業社會基礎上，而把政治秩序建立在移植過來的西方議會民主模式上，這種兩元化的價值系統，就像恩格斯所說：在競爭的商業世界中，其成功或失敗往往不繫於個人的活動和智慧，而繫於他所無法控制的外在情況。^②商業世界是如此，政治世界也是如此。

但就政府改革派來說，他們也並不能確實掌握社會經濟外在情勢轉變的本質。1860年代俄國政府推動一系列的改革，史學家大都同意這些改革對俄國歷史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但對這些改革是影響了俄國一般整體的發展，還是特殊化的發展而以農民為主，卻沒有達到共同的見解。對這些改革持負面評價的在俄國方面以 N. M. Druzhinin 為代表，在西方以 Alexander Gerschenkron 為代表，^③大致認為解放農奴確實在俄國建立了家庭農場，但並沒有造成繁榮而強固的經濟實體。這是因為農業的生產並沒有系統的組織化以提供大量工業人口的需要，這樣，大工業中心的成長將不可能，另一方面，工業區並沒有供給足夠的市場與日益成長的消費人口，那麼，農業生產也無法充分發展。這種農工業的連環性是現代化發展成功的一個重要指標，Druzhinin 與 Gerschenkron 顯然認為1860年代的改革並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持正面評價的在俄國以 P. G. Ryndziunskii 為代表，在西方以 R. Portal 為代表。^④基本上他們認為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